

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追思戴维森

牟博/文

当8月30日晚获悉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 1917—2003)教授在当天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的心情确可以用“十分震惊”来形容。这是因为,大约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17日)我和他在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时,戴维森教授不仅身体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精神矍铄;虽已86岁高龄,但仍思维敏捷。的确,我最近曾问过他是否有何慢性疾病乃至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我记忆犹新:他斩钉截铁地说:“No!”不过他补充说,就是膝盖有时不适。所以当我被告知戴维森因心脏病而去世时,我最初一下冲出的念头是怀疑这是否是谣传;不过,由于消息来源可靠[根据罗蒂(Richard Rorty)当晚发来的电子邮件],紧接着就是感到震惊。戴维森夫人、卡维尔(Marcia Cavell)教授随后在其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澄清说,“唐纳德并非因心脏病而去世。他于8月26日在其最佳健康状况下因实施换膝手术而入住医院。手术本身很成功,但手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唐纳德感到很疼痛。但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在(8月30日)凌晨5点30分他被发现出现心搏停止——急性心律不齐。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言,他的去世与其年龄几乎无关;这是一个目前尚无法理解的意外。”我把卡维尔教授的有关说明原文摘录于此也算是澄清一下误传。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猖獗一时的SARS,戴维森会按原计划在今年7月底和8月上旬来到中国参加下面就要提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北京、上海进行学术访问;那么其手术或许会在更晚一些时候进行;要是如此,按照戴维森此前的健康状况,也许一些偶发诱因会不复存在,或按不同方式起作用;那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结果。嗟叹之余,感到世界上的事情在阴阳互补大格局下有时确是阴差阳错。

不过,令我尤感震惊和遗憾的在于这样一事实:戴维森的去世在下述意义上是国际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不同于很多年迈的哲学家、甚至年迈的著名哲学家,戴维森直至逝世前一直笔耕不辍,如同以往一样专注于深入思考一系列在他看来相互紧密相联的哲学基础问题,不仅可谓宝刀不老,而且自90年代以来成果尤为丰硕。这可从戴维森最近十多年来的论文发表记录略见一斑。继其收集了他在90年代之前重要论文的两部产生重大影响文集[《论行动和事件》(Essays on Actions & Events, 1980)和《对真和解释的探索》(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1984, 2001)]之后,戴维森于2001年出版了题为《主体、主体间、客体》(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的第3卷文集;在其中所辑集的14篇论文中,有6篇属于90年代以来的新作;在其即将出版的题为《合理性问题》(Problems of Rationality)的第4卷文集所辑集的15篇论文中,有9篇属于90年代以来的新作;而在其即将出版的题为《真理、语言和历史》(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的第5卷文集所辑集的17篇论文中,有14篇属于90年代以来的新作。(以上5卷文集均已由或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戴维森去世前,他在美国主流哲学界被视为最有影响的在世哲学家;这诚然主要是由于他自60年代初发表《行为、理由和原因》这篇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后,一系列起开拓作用或对某些既定正统观念起颠覆作用的原创性论文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地位,但这与戴维森近10年来直至逝世前不是退隐,而是一直积极参与很多涉及相关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并不断有新研究成果问世也不无关系。

[在这方面,戴维森看来与奎因(W. V. Quine, 1908—2000)有所不同;1997年夏,我因一资助项目在哈佛作短期研究时,曾就当时写作一篇讨论塔斯基和奎因的文章时遇到的部分关于文本的疑惑而求证于奎因;谈话间我问他目前是否有什么特定的研究项目,奎因答,最近几年来因年事已高已不再专攻特定研究写作项目。]说到戴维森哲学活动不懈探索方面的特点,我想着重谈谈最近几年来戴维森本人及其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建设性互动。我首先谈谈相关背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在此指从古典时期直到清朝发生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运动及其当代的发展和研究)与西方分析哲学(广义地指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英国经验论和康德,直到当代分析运动这一整个作为西方主流哲学之一的分析传统或分析传统的西方哲学),特别是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当代发展,被认为是彼此遥远、无关乃至对立的。其中每一传统中都有一些人将对方传统的哲学实践视为仅仅具有边缘价值。有代表性的定式成见包括这样一些或多或少成俗套的看法:古典中国哲学被当作仅仅具有考古价值的古玩,或满足对异国情趣好奇心的舶来品;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很多方法或成果在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或浅尝辄止地被视为仅具工具价值的雕虫小技。或多或少在诸如此类的定式成见或偏见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过去在国内(我对国内这方面的目前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搞中国哲学的学者可以一般来说心安理得地对当代哲学(特别是分析传统)的新发展置若罔闻;而搞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同样可以一般地说“义无反顾”地对传统中国哲学及其当代研究成果漠然置之。(当然,对各自领域中的考据性、纯描述性工作又另当别论。)此外,正如不少学者现在认识到的,企望通过标示中国哲学的特殊异质、或通过将中国哲学宗教化来强调中国哲学从质上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殊价值,这无异于一种在自身哲学认同上的自杀行为。的确,在国外中国哲学的研究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常常划归于宗教系、历史系、汉学(中国研究)系或文学系],上述态度也难咎其责,尽管有来自其它方面的偏见。现在,越来越多的、既通晓中国哲学又通晓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包括其广义的分析传统主流哲学)不是彼此无关、异质排斥,更不是截然对立;双方迫切需要的是交锋—交融型的建设性对话(constructive engagement),而不是通过强调被认为是与对方毫无干系的“特异功能”和贬抑对方来自抬身价。的确,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和分析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关于哲学性质、哲学方法、不同概念图式之间的通约性、比较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等一系列基础性元哲学问题。我于1999—2000学年在伯克利作访问研究时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从哲学方法论的元哲学角度研讨中国哲学传统与分析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为此组织一个专题研究文

集。由于相关基础性哲学问题也一直是戴维森本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我与他谈了这一研究课题的性质和意义，以及我本人就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戴维森对这一研究课题十分感兴趣。有鉴于此，我后来给他带去一套该研究文集撰稿人的初稿；他欣然应邀为该文集作序。这便是读者后来看到的戴维森为《两条通往智慧之路？——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传统》[Bo Mou ed., *Two Roads to Wisdom?—Chinese and Analytic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Chicago, USA: OpenCourt, 2001)]一书所作的那篇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的序言(其中译文以及该文集部分章节译见《世界哲学》杂志2003年第3期)。

该研究文集出版前后，随着我本人对有关元哲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按照交锋—交融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路对《易经》哲学、道家哲学、儒家思想等课题所开展的若干专题比较研究[其部分研究结果，参看文集《对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Bo Mou ed.,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3)]，我感到开展这种交锋—交融式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有效方式之一，便是针对西方哲学传统或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某一有影响的重要哲学家，开展其思想与另外那一哲学传统中相关思想的交锋—交融型建设性对话。而根据我本人对戴维森哲学的了解，他对一系列哲学基础问题的深入探讨、他对未知领域的不懈探索愿望和他对批评和挑战，持有一贯的积极态度，我感到戴维森哲学是交锋—交融式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合适对象。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约两年前，我跟戴维森谈起有关召开一个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关思想之间比较研究的国际研讨会这一设想及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我向戴维森特别强调，这一学术研讨会将不是以“颂扬”为主旨的对其哲学思想的庆功会，而是旨在思想交锋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会。的确，他对未知领域的不懈探索愿望和他对将会面临的批评和挑战所持有的积极态度，使他对这一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和对话方式很有兴趣；他表示不仅愿意亲自出席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而且愿意亲自担当所有大会专题发言的评论人。

随后，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SCWP)]于2002年正式成立。该学会强调(但不限于)中国哲学与西方主流哲学(广义上的西方分析哲学传统和西方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它强调比较哲学研究对于当代哲学研究发展及其解释性资源的关切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一特有途径，该学会不仅致力于对中国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做出贡献，而且致力于对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哲学研究做出贡献。该学会还强调努力建立作为中国哲学发源地的中国语言文化地区与西方世界之间在哲学领域里开展学术交流的渠道和途径。戴维森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担当该学会的咨询顾问(Advisor)。

在这一背景下，上述关于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国际研讨会便成为由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会议东道主)和美国哲学学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合作，原订于2003年7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主题为：“哲学交锋—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Philosophical Engagement: 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的国际专题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是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与国内学术教育机构合作举办、旨在促进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特别是其主流传统)之间建设性对话与交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中的第一届。它在论文选择、会议规模等问题上，采取强调学术性、注重质量和实质性哲学对话、以及不片面追求规模与轰动效应的方针。

但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发生了SARS疫情。眼见SARS疫情在北京日益严重，大概在4月中旬，我向戴维森介绍当时SARS疫情发展，并讨论上述国际研讨会在今年举行的可行性问题；还有一个目的是看看戴维森本人的态度如何。多少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戴维森说：这完全由你们决定；我本人随时准备前往。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对诸如SARS这样的疫情我的抵抗力比你们年轻人强。他的理论大致是：年迈者对此久经沙场、免疫力非同小可。我虽然一时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因为SARS毕竟是一种当时人们尚未充分了解的新疫情；我不知他的病毒免疫说会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SARS)，但我当时无疑为戴维森的积极乐观态度所鼓舞，便向会议组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建议再拖一段时间。但将近4月底时，SARS疫情的严重性使我们别无抉择。这样原订于今年7月下旬、8月上旬的国际研讨会及戴维森对中国的学术访问均推迟到明年夏季；戴维森从而在7、8两个月作了其它一些安排(我尚未核实这是否包括他的换膝手术安排)。

因此，戴维森的去世不仅在前述意义上对于国际哲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对已经作好较充分准备的上述国际研讨会计划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与戴维森本人就一系列哲学问题直接面对面地开展交锋—交融式建设性对话的机会不复存在。但是，经过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理事会对会议可行性及其价值和意义的慎重考量，以及来自原订专题发言人的积极正面回应，这次国际研讨会在针对戴维森去世而作出适当调整的情况下将仍然在明年夏季举行，以此作为纪念戴维森教授对于跨越文化与民族疆界的共同哲学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主要调整如下：(1)研讨会名称改为“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纪念唐纳德·戴维森”(“中国哲学”一词的含义在这里按广义理解：它不仅限于传统中

国哲学及其当代研究，而且包括当代中国哲学家对戴维森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2)研讨会将扩展成由相互受益、相互促进的两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哲学交锋—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这一部分专注于戴维森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及其当代研究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第二部分：“中国哲学家论戴维森哲学”，这一部分专注于当代中国哲学家研究戴维森哲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欢迎国内有兴趣的学者积极投稿，详情见载于本期封三的“纪念戴维森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三

戴维森在哲学上的不懈探索、勇于挑战和面对挑战与其生活旨趣上的某些特点取向可以说相辉并映；了解后者或许对于我们了解戴维森的完整人格不无裨益。下面择取若干事例。

读者也许知道，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圣荷赛湾区(the Bay Area)有两所较大的知名大学，一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一为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其风格迥异，恰似一对互补阴阳(有人曾分别用《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来比拟其不同风格)。人们也许会问，戴维森为什么会在1981年选择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非他曾从50年代初直至60年代中期任教并亲手将其哲学系打造成型的斯坦福大学？戴维森在其最近的思想自传中解释了他为什么于1981年最终选择来到位于湾区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其终身任教的大学，从中我们可以对戴维森的人生旨趣略见一斑。[参看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Chicago, USA: Open Court, 1999)P. 58.]除了提到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一些特点外，他强调了一些一般性人文因素和环境因素：他说，“我很喜欢湾区的气候、附近的海洋和山峦以及大量的公共用地”；虽然斯坦福大学也在湾区，但“公立大学比起私立大学更合我的口味；我喜欢公立大学学生的多元化，他们更容易融合，而且在那里能感受到对政治事件的参与感。”的确，在戴维森身上，你看不到那种自诩高人一等、傲慢的“精英”意识和装腔作势的“贵族”派头，而是一种深切的平民认同感和对大自然的爱。

甚至在衣着上戴维森也在某种程度上“衣如其人”。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Open Court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高水

准的名为“在世哲学家图书馆”的在世著名哲学家系列，每卷封面均有一张所论及的哲学家的封面照；就我所看到的那些已出版的单卷而论，其他当代著名哲学家卷的封面照均为很正式的西装领带正襟危坐照，唯有戴维森卷的封面照是他的一张敞着领口、随便地身着普通牛仔装的生活照。在本刊刊登的那张今年7月的照片上，读者或许会看出，戴维森穿的是一条普通的蓝色牛仔裤。

戴维森喜爱登山和冲浪；拥有双引擎飞机驾驶执照；他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今年6月刚从非洲坦桑尼亚探险归来。他期待有生之年能去世界屋脊西藏一睹高山大川、荒野莽原。这一切均浸透着戴维森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困难和挑战的正面积极态度。四最后，我不妨就我的个人经历谈谈几件反映戴维森如何看待批评和不同观点的小事。

这或许多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戴维森作为哲学家之为人，也恐怕或多或少与上面所谈到的戴维森在生活中的平民认同感不无联系。在我1989年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及从事取得学位后第一个教职的近十年间，我一直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州；而戴维森在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在此期间我们并无什么个人间的直接交往，而仅是有时询问一些学术问题的通信联系。在我于1999-2000学年因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一年专题研究时，虽然有机会与他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但一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谈及我本人的一些不同意见；因为，虽然一般来说在美国学术界(包括主流哲学界)有自由讨论、相互批评的气氛，但戴维森的名望毕竟不是在读研究生学位时的同学或在系里教书的同事。譬如说，当时我继续修改的论文之一[该文后来发表于《综合》(Syntheses)杂志2001年第1期]，讨论了塔斯基真理定义的枚举性和塔斯基系统的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该文在基本观点上与戴维森的观点不同。开始时我的确有顾虑是否在这一问题上谈及我的不同看法。但随着个人间讨论的增加和对他人对人的了解，我也开始直言我的一些不同看法(包括在上述问题上的很不同的观点)。事实证明，我的那些顾虑大可不必：戴维森不仅并无不悦、平易近人，而且认真聆听不同意见，耐心地解释他本人的看法。这使得我在以后的讨论中可以放开讨论不同看法。我与他在今年7月最后一次讨论时所论及的问题之一，便是关于他所坚持的“弹弓式论证”(Sling-shot Argument)的有效性问题。

另外一件小事是这样。大约在15年前(1988年前后)，当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时，我着手择选戴维森此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翻译成中文(主要是从1984年版的戴维森论文集《对真和解释的探索》选出)，一方面是作为个人研究过程，一方面是希望将戴维森的重要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哲学界(这些译文辑集为题为《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的戴维森哲学文选由商务印书馆于1993年出版)。在翻译上述文集中的一篇论文时，我感到一处论述似有错误。当时为慎重起见，我给戴维森去信求证。他很快便回信同意我的看法。这件事本是小事一桩；要不是戴维森本人多年后提起，我早已忘却。但是，戴维森2001年在为《对真和解释的探索》一书第二版所作序言中郑重地写道：在本书新版中，“我更正了第一版中的印刷错误。但在第299页上我更正了一个真正的错误。这个错误是由牟博在将该文翻译成中文时发现的。据我所知，我的这个错误尚未被此前将该文翻译成其它(7种)语言的译者所注意到。”在诸如此类的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僅僅是一个学者对相关学术规范的认真，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对待批评与异见的诚挚态度和令人敬佩的人格。的确，哲学的力量在于批评和能被批评；哲学可以起始于神秘，可能肇端于教条，但不能满足于或终结于他人不可理解的神秘和不容置疑的教条；因为两者均不容批评。在我看来，这正是戴维森通过其著作和人格所体现的分析传统仍保持其悠久生命力的肇因之一。

(责任编辑：鲁旭东)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65137744-5520 传真：(010)65137826